



打开中华典籍

汲取文化力量

谛听古籍



《梦溪笔谈》 科学史坐标

□马小江

《梦溪笔谈》是北宋科学家、政治家沈括撰写的一部涉及中国古代自然科学、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，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其为“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”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梦溪笔谈》是现存最古版本，元大德九年(1305)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。卷首有“东官书府”“文渊阁”两方朱文方印，卷内还钤有“汪士钟印”“平阳汪氏藏书印”“臣文琛印”“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二度携书避难记”等印。《梦溪笔谈》共30卷，内容涉及天文、历法、气象、地质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农业、水利、建筑、医药、历史、文学、艺术、军事、法律等诸多领域，反映了我国古代、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这部《梦溪笔谈》在元代时藏于宫中，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后将其赠送给太子朱标，后又归入“文渊阁”。清代从宫中流出，为汪士钟、松江韩氏先后收藏，后又为近代著名藏书家陈澄中收藏。1965年，陈澄中有愿将包括这部《梦溪笔谈》在内的这批珍贵善本出让，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国家斥巨资购回。

沈括(1031—1095)，字存中，北宋科学家、政治家，今浙江杭州人。他的父亲做过地方官，母亲精通文学，沈括在这种家庭的熏陶下，14岁就读了家中丰富的藏书。成年后，他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。在这里，沈括接触到了许多古代科学知识，阅读了大量皇家内藏书籍。后来，他发明了地磁偏角；通过对凸凹镜的观察实验，得出光线通过小孔与焦点形成光束的光学原理；最早记载了胆水炼铜的方法……沈括和他的《梦溪笔谈》所作的贡献在我国及世界科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



《齐民要术》 农业活字典

□雷焕

民以食为天，几千年来，农业生产始终是我国历朝历代的重中之重。在北魏孝文帝至东魏武定二年(533—544)，杰出农学家贾思勰编著了内容极为丰富的综合性农书《齐民要术》，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农、林、牧、渔、副等行业的生产技术知识，位居“中国古代五大农书”之首。该书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，被誉为“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”。

《齐民要术》全书11万余字，其中正文7万字，注释4万字。正文分为10卷92篇：卷一，耕田、收种、种谷各1篇；卷二，谷类、豆、麻、稻、瓜、瓠、芋等粮食作物栽培各13篇；卷三，种葵、蔓菁等各12篇；卷四，园篱、栽树各1篇，枣、桃、李等果树栽培各12篇；卷五，栽桑养蚕1篇，榆、白杨、竹以及染料作物10篇，伐木1篇；卷六，畜、禽及养鱼6篇；卷七，货殖、涂瓮各1篇，酿酒4篇；卷八、九，酿造酱、醋、乳酪、食品烹调和储存22篇，煮胶、制墨各1篇；卷十，北魏疆域以外地区五谷果蔬菜茹1篇；记热带、亚热带植物100余种，野生可食植物60余种。该书对农学类目作了较为合理的划分，精辟透彻地说明了黄河中下游旱地发展农业技术的要领，有6篇分别叙述养牛、马、驴、骡等家畜、家畜的方法，总结出“食有三时，饮有三时”的成熟经验，将动物养殖技术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
《齐民要术》从6世纪初写成，到北宋时期的500年左右，全靠手抄在民间流传，至今世界上已有20多种译本出版。它卓越的科学内容，对当时和后来的农业生产都有深远影响，不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，也是世界古代自然科学史上的一颗明珠。

《历代通鉴纂要》 载数千年事

□何砺著 冯丽丽

《资治通鉴》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。全书共294卷，300多万字，记载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年)，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(959)，以时间为纲，事件为目，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。原名《通志》，神宗认为其稿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政道”于是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亲自为其作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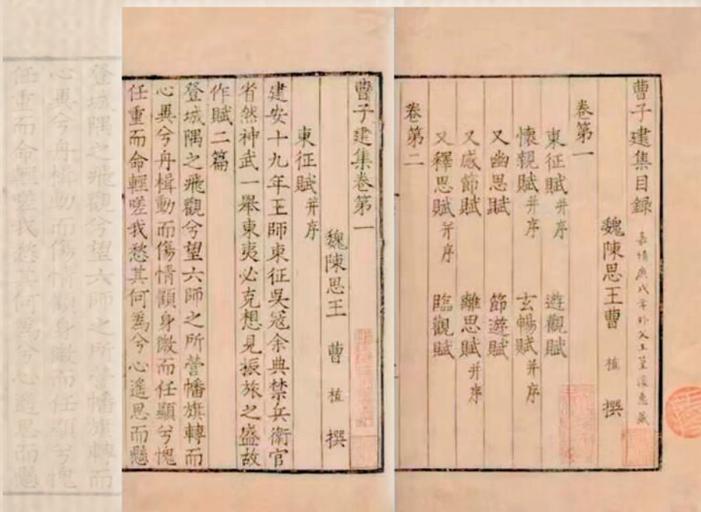
《资治通鉴》材料丰富，考证严谨，文字精炼生动，为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资料，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纵观我国古代史书，只有司马光的传世巨著《史记》能与之媲美，司马光也因此与司马迁并称“史学两司马”。南宋王应麟曾言：“自有书契以来，未有如《通鉴》者。”清代王鸣盛亦言：“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，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。”自《资治通鉴》成书问世，影响甚巨，成为一门专学，注解者有之，简编者有之，续补者亦有之。

进入明代后，《资治通鉴》与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等一起被确定为皇室的必读书籍。万历年间，宗学规定贵族子弟所习科目中，除了学习明太祖皇帝所颁之《皇明祖训》《孝顺事实》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性理》外，还包括《资治通鉴》。由此可见明代统治者始终将《资治通鉴》作为“帝王教科书”。为阅读方便，出现了《资治通鉴》缩编本，如《通鉴博论》《通鉴纲目》《续通鉴纲目》等。明孝宗尤喜读《通鉴纲目》。相比于《资治通鉴》，《通鉴纲目》虽已简

化不少，但仍然卷帙繁多、不便阅读。于是，孝宗于弘治十六年(1503)命大学士刘健、李东阳及谢迁等翰林儒臣，摘取《通鉴纲目》《通鉴纲目前编》及《续通鉴纲目》诸书中“尤切治道者，各照原文，通加节书”著成《历代通鉴纂要》一书，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。

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馆藏的《历代通鉴纂要》92卷，为明正德二年(1507)内府刻本。现存七卷(一至七)，四册一函。版框高25厘米，宽17厘米；开本高36厘米，宽22厘米。半叶10行，每行20字。四周双边黑口，双对黑鱼尾。鱼尾中镌书名、卷数、页码，书耳镌年。正文前首列正德二年《御制序》，首、末页钤朱文方印“广运之宝”；次列正德二年李东阳等《进历代通鉴纂要表》、职名、凡例、书名、先儒姓氏、目录。卷端及每册首页钤朱文方印“表章经史之宝”。二印均为明内府藏书印记。

此书记载内容起自三皇，终于元末，仿照《通鉴纲目》的体例，周威烈王之前，参用《通鉴前编》《皇王大纪》等书，宋以后则以《续通鉴纲目》贯穿，载古今数千年之事。该书有明正德二年(1507)内府初刻本、明正德十四年(1519)慎竹斋刻本、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广雅书局刻本等。明代内府刻本为中国雕版印刷史上重要版本类型之一。皇家刻书因有强大的人力、财力支撑，所刻之书从用纸到装帧，从字体到版式等诸多方面质量均属上乘。其版式宽大、行格疏朗、大黑口、鱼尾相向、大黑双边、字大如钱、多做起体、纸墨俱佳，阅之醒目怡神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馆藏《历代通鉴纂要》就有此特征，因其重要版本价值入选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



《曹子建集》 曹植的诗赋

□鱼子涵

曹植，字子建，是曹操的三儿子，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、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。收藏于广西博物馆的《曹子建集》共10卷，收录了曹植的诗文辞赋。其中，赋40余篇，散文近百篇，较完整的诗歌80余首，一半以上为乐府诗体。

赋分为纪事、志述、咏物类。取材广泛，形制短小，感情强烈，尤其《洛神赋》影响很大。《洛神赋》以传说中的洛水之神宓妃为题材，通过幻想，塑造出洛神这个美女形象，表达了作者对她的爱慕以及因神人殊隔不能如愿的惆怅。赋中描写细腻生动，形象鲜明，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。

散文包括颂赞、铭诔、碑文、哀辞、章表、令、书、序、论、杂说等多种体裁。语言华美流畅，代表作有《与杨德祖书》《求自试表》《籍田说》等。

曹植的诗以五言为主，形成了骨气奇高、辞采华茂的独特诗风，一方面感情执着强烈，笔力雄健，体现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风，另一方面，追求词采的整练与华丽，呈现色泽丰富、文采斐然的面貌。他的诗以其兄曹丕即位分为前后两期。前期诗歌分两类：一是表现他作为公子的游宴生活，不时有忧生之嗟，如《箜篌引》《公宴》等；二是写时代感受，反映离乱社会风貌，抒发建功立业的雄心，代表作有《送应氏》《名都篇》《白马篇》等。后期诗作则更多反映了壮志不得施展的愤愤不平之情及苦闷，表达了对下层民众痛苦生活的同情。所作善用比兴手法，语言精练词采华茂，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影响。其代表作有《七哀诗》《白马篇》《赠白马王彪》《泰山梁甫行》等。

曹植的诗全面代表了建安时代诗歌创作的成就，对后世文学尤其是五言诗的发展影响甚大，曹植因此被视为五言诗的一代宗匠。东晋至刘宋时期大臣、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评价说：“天下文章只一石，子建独得八斗。”因此，曹植又得“曹八斗”雅称。

《困学纪闻》 考据学力作

□胡胜盼

《困学纪闻》与《梦溪笔谈》《容斋随笔》并称为宋代三大笔记，是南宋文献学家王应麟的力作，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该书自问世以来，各种版本刻印不绝，其中元泰定二年(公元1325年)刊刻的版本为各种版本的源头。

青岛市博物馆珍藏的元泰定二年明递修《困学纪闻》二十卷刻本，2009年入选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该刻本纵27.8厘米，横16.3厘米，线装，不分栏，每页10行每行18个字，大黑口，四周双边，双鱼尾。钤印“重意堂”“阴文”“海丰吴氏”“石莲阁所藏”“科”“登”“连珠阳文”。递修本，指书版屡经修补后刷印的善本。书版因刷印次数过多或存放时间太久而损坏，经过修版、补刻后延长其使用寿命。

王应麟(1223—1296)，字伯厚，宋庆元府(今浙江鄞县)人，除撰写著名类书《玉海》外，还有《诗考》《汉艺文志考证》《诗地理考》和《深宁集》等。王应麟在《浚仪遗民志》中写道：“嗜学不倦，为《困学纪闻》。”在《困学纪闻》自序里讲：“幼承义方，晚遇黜屯。炳烛之明，用志不分。困而学之，庶自别于下民，开卷有得，述为纪闻。深宁叟识。”由此可知，《困学纪闻》是王应麟在晚年编著的学术精华。

《困学纪闻》以考据见长，直接影响了后世考据学的发展，受其影响最直接的是他的学生胡三省。胡三省为《资治通鉴》作注，其注文不仅解释名词，补充史实，还广泛涉及到校勘、考证、辨误、评论等方面的内容，尤其是对地理的通释。《困学纪闻》还直接影响了清代考据学派。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奠基者顾炎武撰述《日知录》一书，深受《困学纪闻》影响，从体裁到内容都效仿了《困学纪闻》。此外，阎若璩的《潜邱札记》、王引之的《读书杂志》、钱大昕的《十驾斋养新录》等，在考据的方法及考据的范围中都可捕捉到《困学纪闻》的影子。

